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

乾隆二十八年京口驻防汉军出旗拨补与伊犁驻防

孙守朋

[摘要] 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六份满文档案为核心史料，辅以乾隆朝宫中档、实录等档案文献，考察乾隆二十八年京口离驻汉军旗人的安置、江宁蒙古旗人移驻京口以及汉军出缺与新疆驻防关系等，揭示京口汉军出旗拨补的推动力为伊犁驻防兵力调配，从而成为全国军事部署调整中的一环，同时使旗人生计这一久悬的问题得以解决。

[关键词] 驻防八旗　汉军　出旗拨补
[中图分类号] K24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15) - 04 - 0100 - 07

京口位于长江中下游与运河交汇处，“襟江带海”，为“东南锁钥”之地，地理形势优越，历来是军事重镇。清初在此设立八旗驻防，由汉军旗人单驻，但到乾隆二十八年 (1763)，清廷令京口汉军出旗，由江宁蒙古旗人充补。关于京口汉军出旗在一些论著中有所涉及①，其中以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最为深入，书中有关京口汉军出旗的阐述分散在相关章节中，讨论了京口出旗为民与八旗驻防调整的关系、出旗与否相关议论等问题。或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成果对于汉军出旗如何拨补绿营、江宁蒙古旗人如何调补京口叙述不详。拨补内容叙述不详的另一方面原因，也是重要原因，即相关文献的局限《京口八旗志》关于汉军出旗一略而过，《清实录》只记载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军机处议覆内容。幸运的是，2014 年夏季，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数份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这些档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京口汉军出旗政策的制定、汉军旗人拨补安置措施、江宁蒙古旗人移驻京口等情况。再结合《清实录》、《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京口八旗志》等档案文献，可知京口汉军这些出缺给予了索伦和察哈尔蒙古等旗人，揭示了清廷军事部署调整政策之下的伊犁驻防是京口汉军出旗的推动力，从而促进解决旗人生计这一久悬的举措得以实施。

一、自愿出旗为民原则

京口汉军出旗为民实行自愿原则，乾隆二十八年 (1763) 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传达上谕

[收稿日期] 2015 - 09 - 13
[作者简介] 孙守朋 (1976—)，男，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满族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四平 136000；ssp030725@163. 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批准号：15BZS062) 成果。

①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孙守朋《八旗汉军官员与清代政治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年；王刚《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等。

"将京口驻防的汉军旗人全部出旗，或者成为民人，或者调用为绿营。"江宁将军容保（Žungboo）等遵循此原则，"江宁将军容保立即赶往京口，副都统永杰（Yunggiye）、范宜忠（Fan I Jung）等一起召集八旗官兵，传达圣旨。……情愿为民者，按例出旗。"自愿出旗者"自己亲自去省的州县察明、呈送，加入出旗民人的档（gūsaci tucibufi irgen i dangsede）① 中。京口的汉军情愿出旗为民者，现在陆续呈送咨文。数目确定后，做成户口册，报告部、旗后，削去旗籍，在他们选定的地方，成为民人。"②

"世家大族披甲、执事人、闲散"起初按规定不在出旗之列，而在该年十月，根据自愿原则，政策有所调整，"开国归附随龙入关世袭罔替官员、勋旧佐领、世管佐领有承袭份人的子孙……若搬家有困难，可以免回原旗，想成为民人者，立即将登记到愿意入的民人档子。容保等还将查问之处进行分类，派送至各旗。愿出旗为民者，削去他们的旗分。"③ 可见，原先出旗之汉军旗人不包括世家大族子孙，但是随后政策放宽，若汉军世家大族归旗有实际困难，可以不归旗，自愿加入民籍。汉军出旗政策之初，是不允许世家子弟出旗的，是因为此类人随龙入关，为开国勋臣，清廷不让出旗，意在稳定人心，但是后来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④ 也允许这些人出旗。可见，从此方面来讲，京口汉军出旗与整个出旗政策放宽趋势相一致。

自愿原则下，也可以不出旗，即保持汉军旗人身份，或归旗，或就近选任。例如，汉军世家大族子弟"自愿出旗为民五人，全部加入他们选定的地方民籍，除承袭官资格，该旗发文销去外，剩余骁骑校一员，秀才二名，兵十九员，自愿归旗"。⑤

京师汉军出旗基本出于自愿，清廷的态度比较宽容。而对驻防汉军，既然是悉令出旗，说辞尽管冠冕堂皇，实质上却是强迫实行。⑥ "京口驻防的汉军旗人全部出旗"，即必须离开京口驻防，之后才是自愿出旗为民。可知，自愿原则是在强制政策下一定程度的"自愿"。

二、京口汉军出旗安置与调补

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议定福州"愿为民之汉军，无论世族、闲散，准入民籍；愿为民而别无生计，惟借粮饷赡养者，分派近省绿营，坐补粮缺"。⑦ 福州汉军挑补绿营缺详细规定："汉军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于督标、陆路抚标、福协、军标各营内，遇有粮缺，四缺中补汉军三人。其子弟曾习弓马者，入余丁内考拔，俱准在食粮地方入籍应试'，"汉军甲兵应先尽马甲改补一千名，于省会各营马粮内，坐补六百名。其余遇有马粮，即补马缺，如无，即以步、战粮通融酌补"。⑧ 驻防汉军出旗从福州开始，所以福州汉军出旗的这些安置与调补措施为后来的广州、杭州、凉州、京口等地汉军出旗提供了范例。

据江宁将军容保、两江总督尹继善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中旬奏报，当时京口驻防八旗汉军兵员

---

① 出旗汉军旗人加入愿入的民人档册中。此外，这些出旗汉军另建户口册，以便报部、旗，削去旗籍。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容保、尹继善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档案号：03－0180－2008－025。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等奏报京口汉军情愿出旗为民数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80－2057－009。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新文丰出版社，1978年，第2页。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等奏报京口汉军情愿出旗为民数目折》，档案号：03－0180－2057－009。

⑥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⑦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7，中华书局，1987年，第1288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

数为三千零九十二人。[①]（见表1）截止本年十月末，自愿出旗兵员人数为一千三百二十人。[②] 出旗子弟“如果想要进入文武贡院考试者，可以（与汉人）一体考试，若是捐官，若有贡生监生，各地方官们查明、呈送，更换文书，在该州县考试、结亲如民人一样。再，成为民人的众人中，世袭官所有者依京师汉军例，出旗时仍拥有（世袭官资格）；袭职时，由地方官们保举，携带咨文，送至部院使承袭，如何拣选使用、执行公务等情况，待引见后，遵旨办理”。[③] 可见，汉军自愿出旗后，科举、婚姻与民人享受同样待遇。

表1　京口汉军兵员数目

类别	领催	骑兵	炮手	工匠	步兵	总计
数目	402	1 598	72	20	1 000	3 092

京口汉军兵丁除自愿出旗为民者之外，就是想吃钱粮者，先就近调补绿营，然后入当地民籍。但是“在京口只有将军部下左右翼二兵营，再有镇江城镇守兵营，总计一千八百余兵，数目不多，若是都分派到这三营使用，不得不久等。”所以容保、尹继善筹划“将军部下的兵营、镇江城镇守兵营及京口附近有水兵左右翼兵营，瓜州、扬州、太平、泰州、常州等营，总督、巡抚、漕运总督、河道总督、提督、狼山总兵部下的所有兵营，及各城镇守兵营，总计二十余营，与京口相距不太远，全通水路，视兵营之大小，考虑兵之多少，平均分派出缺后，陆续调补，四缺中补汉军三人，补绿营一人，汉军人中若原为步兵的，理应补步兵缺；原为领催、马甲的，理应补骑兵缺。但诸营骑兵缺不多，导致久等，如果可以的话，若遇到缺，按福建例补先前的兵缺，骑兵出缺后，再补。在哪个兵营吃钱粮者，就入该地方的民人档案。”[④] “经军机处议覆改补绿营充伍兵丁限至本年十月为止，全行裁汰，如至期有改补未完者发往应补营分候缺。”[⑤] 京口汉军总兵数为三千零九十二人，自愿出旗为民者为一千三百二十人，剩余的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即为拨补绿营者。这一数字比自愿出旗人数多，从清廷的本意来看是想汉军自愿为民多多益善，可减轻财政负担。自愿为民者与拨补绿营人数还是比较接近的，对这一结果清廷比较满意，起码这些旗人分散到二十多绿营中，一定程度可消解旗民冲突与矛盾。一千七百七十二名吃钱粮兵丁，在不能久等的前提下，京口附近二十多营参与安置，汉军四缺补三缺，而汉人只补一缺，如此大规模的调补照顾了汉军利益，却损害了汉人的权益。尽管如此，可能当年十月份还不能调补完成，仍有候补者。[⑥] 可见，兵丁调补安置任务艰巨。

汉军官员防御以上官员送部带领引见，其中京口副都统范宜忠调补正白旗汉军梅勒章京[⑦]，其余“呈文自愿出旗为民人的协领二人，参领二人，防御十八人，全部按例改为民人。”除此之外，‘剩余五个协领，六个参领，二十一个防御，一个世袭骑都尉，总共三十三个官员”，容保等“看他们马步射考语挑选，世袭官有继承资格的有五个，发遣到兵部，该旗建档分别带领引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容保、尹继善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档案号：03－0180－2008－025。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奏报办理京口汉军出旗为民事宜折》，档案号：03－0180－2057－007。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容保、尹继善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档案号03－0180－2008－025。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容保、尹继善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档案号03－0180－2008－025。

⑤ 《两江总督尹继善奏为酌议办理裁汰汉军改补绿营充伍事宜折》，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8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第824页。

⑥ 最终各营各拨补多少愿吃钱粮者，目前未发现有文献记载，尚待确定。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范宜忠奏自京口调补京城正白汉军旗副都统谢恩折》，档案号：03－0180－2019－030。

见，或者作为旗官任用，或者调入绿旗任用，或者按原来的品级休致。”骁骑校等不送部引见，“总共四十二名骁骑校和笔帖式中，江宁在调动使用一个，有世袭官资格一人，呈文自愿出旗为民者四人，一个升任笔帖式，减少剩余骁骑校二缺，剩余的，奴才等考核他们的马步射，之后派送给总督，候补各军营中的千总把总缺。有三名笔帖式和一名记名领催，被派到我们兵营中等候外委把总缺。”① 由此统计，出旗汉军官员二十六名（表2），未出旗官员七十一名（表3）。

表2　京口汉军官员出旗数目

类别	协领	参领	防御	骁骑校和笔帖式	总计
数目	2	2	18	4	26

表3　京口未出旗汉军官员数目

类别	副都统	协领	参领	防御	世袭骑都尉	骁骑校和笔帖式	总计
数目	1	5	6	21	1	38	71

汉军官员防御以下级别官员，即骁骑校和笔帖式等没资格送部带领引见。骁骑校“以绿营千总补用”，笔帖式“情愿改补武者，以千把补用候补，笔帖式及记名领催，皆以外委补用。”两江总督尹继善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奏报“改补绿营兵丁十月之限将届，其裁汰骁骑校等，于查办丁兵事竣之后，即应遵照原议以绿营千总等项补用。查骁骑校四十员，内除辞退为民及升补事故六员外，实应改补绿营千总三十四员，又笔帖式改武应补绿营千把一员，江南通省漕河督抚提镇暨将军等标营共计陆路内河千总一百十余员，每年出缺无多，尚有绿营技艺优娴之把总应行考拔以示鼓励，若骁骑校三十四员专俟千总缺出补用，势必守候日久难以得缺。”尹继善“再三斟酌，江南陆路内河把总共有二百三十余员，每年所出之缺较多，于千总似应于千把两项内酌量借补，方不致日久守候，应请于通省各标营、陆路、内河千把所出缺内以一缺补用骁骑校，以一缺拔补绿营人员。其借补把总之骁骑校，仍俟有千总缺出，与绿营应行考拔人员一递一缺，轮流间补，似此通融办理约计一年有余，骁骑校可以补用全完，而于绿营拔补之阶仍无妨碍。至裁汰候补笔帖式三员、记名领催一名，为数无多，即于京口江宁两标营就近补用外委千把，无庸通省各营分补。”②

对于汉军世家子弟的安置。“京口的汉军旗官兵内骁骑校一员，秀才二名，兵二十四员，全部是开国归附随龙入关世袭罔替官员、勋旧佐领、世管佐领有承袭份人的子孙”，他们全部不得引见，可以归旗，也可根据实际困难，出旗为民。最后“自愿出旗为民五人，全部加入他们选定的地方民籍，除承袭官资格，该旗发文削去外，剩余骁骑校一员，秀才二名，兵十九员，自愿归旗。因此，将彼等派至该旗，由该旗带领引见。”③

费用方面，清廷给予汉军旗人理应得到的马价银和芦滩银，“作为他们搬迁的路费银”，再有“众人中闲散的没有依靠的鳏寡独孤者，赏赐他们银子。”“汉军众人亏欠的官银，从他们应得的银子中按照原来款项数目扣除。”④ 另外，调往绿营的京口汉军旗兵，每人赏给三两银子，用以盖房。“归旗的兵众，每人赏给六两银子。”⑤ 各项银两合理利用，为汉军出旗拨补提供了保障。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奏报办理京口汉军出旗为民事宜折》，档案号：03－0180－2057－007。

② 《两江总督尹继善奏为酌议办理裁汰汉军改补绿营充伍事宜折》，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8辑，第824页。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等奏报京口汉军情愿出旗为民数目折》，档案号：03－0180－2057－009。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奏报办理京口汉军出旗为民事宜折》，档案号：03－0180－2057－007。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军机大臣傅恒奏请赏给解退回旗为民之京口汉军兵丁银两折》，档案号：03－0180－2062－006。

从文献记载来看，京口汉军出旗的安置与调补内容较为详细。京口汉军官兵及家眷众多，出旗调补错综复杂，头绪繁多，清廷仿“福建例”，按官兵、世家大族等“分别办理”，又充分考虑各种特殊因素，费用充足，最终条分缕析，各得其所。

三、江宁蒙古旗人调驻京口

福州汉军出旗以满洲旗人充补，而京口汉军出旗调补与此不同。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传达上谕 “将裁下的江宁千余满洲、蒙古兵选派到京口驻扎。”① 江宁八旗驻防为满洲、蒙古混驻，最后，只将蒙古旗人移驻。可见，在此过程中还是照顾了满洲旗人利益，省去了搬迁之苦。

在将汉军旗人调离京口时，清廷已开始将江宁蒙古旗人调补京口驻防。因京口驻防汉军“系水师营缺”，故“拣派熟谙水师营事宜者”。② 江宁将军容保等“酌情先将原来派遣到江宁的蒙古旗官兵之半数在五月内移驻，剩余的一半，待汉军众人调往绿营将要结束时，在十月内全部移驻。”③移驻京口蒙古旗人官员五十一名（表4），兵员一千五百九十二名（表5），“移驻京口官兵家口人众取道陆路而行较难，由水路到达较容易，且大大节省费用。”故容保、尹继善“安排江宁官船四十只，水师营的船十二只，进行编队，使其乘船移驻。使用这些船只，不用水脚费。”④蒙古官兵平均分成两队，乘坐官船，前去驻防。其中一队已于五月迁移到京口驻防，剩余的一半官兵分成二队，在十月十二日始起程，在本月十七日全部陆续顺利到达京口。⑤

表4　江宁蒙古旗人移驻京口驻防官员数目⑥

类别	掌印副都统	左翼协领掌左司关防兼佐领	右翼协领掌右司关防兼佐领	佐领	防御	骁骑校	笔帖式	总计
数目	1	1	1	14	16	16	2	51

表5　江宁蒙古旗人移驻京口兵员数目⑦

类别	领催	委前锋校	前锋	马甲	炮手	步兵	养育兵	工匠	总计
数目	96	4	52	985	29	228	150	48	1 592

再者移驻费用充足。“江宁蒙古旗官兵移驻京口需要钱粮和使用物品，赏给官员四月的俸禄、士兵一个月的钱粮，以用搬迁。”“将此银两就近由江宁布政使库中支借。来年内扣还。”⑧

移驻京口的蒙古旗人不与民人混合安置，其居住区与民人居住区之间立下界桩，把“汉军众人交出的官房，平均分配给蒙古旗的官兵，使其居住。”⑨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容保、尹继善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档案号 03－0180－2008－025。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转引自《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第 32 页。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宁将军容保、两江总督尹继善奏安置京口汉军旗官兵出旗为民折》，档案号：03－0180－2026－001。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宁将军容保、两江总督尹继善奏安置京口汉军旗官兵出旗为民折》，档案号：03－0180－2026－001。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奏报办理京口汉军出旗为民事宜折》，档案号：03－0180－2057－007。

⑥ 据《京口八旗志》统计。

⑦ 据《京口八旗志》统计。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宁将军容保、两江总督尹继善奏安置京口汉军旗官兵出旗为民折》，档案号：03－0180－2026－001。

⑨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江宁将军容保奏报办理京口汉军出旗为民事宜折》，档号：03－0180－2057－007。

从以上措施来看，清廷官船分批派送、赏予俸禄钱粮等方式调补江宁蒙古旗人到京口，并坚持旗民不杂处原则，令移驻蒙古旗人居住于原汉军官房，尽量避免旗民矛盾。这些安排可谓周密、紧凑，江宁蒙古旗人成功移驻京口。

四、京口汉军出缺与伊犁驻防

办理京口汉军出旗的官员宣称 “京口汉军旗人世代被国家养育，享受圣主鸿恩。百余年人口繁衍众多，生计维艰。现在圣主施殊恩，使彼等出旗为民。”① 当时京口驻防官兵三千多名，加上家眷人口应在一万二千人以上，以“人口繁衍众多，生计维艰”为由，令汉军出旗合情全理。况且解决生计问题，是汉军出旗通行的缘由，渐成多数论著唯一的解释。定宜庄将汉军出旗与全国驻防兵力调整予以结合的探讨②，为研究京口汉军出旗开拓了视野。

18 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击败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武装，从而“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乾隆二十七年（1762） “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伊犁将军的设立，揭开了清朝全国军事布局调整的序幕。此时，西部的凉州、庄浪已非“西陲冲要”，故二处“旧驻满蒙兵三千二百名，现在无须防守”，令“携眷移驻伊犁”；二处其余“汉军兵一千名，照出旗例裁缺，交该管将军，或拨归绿营，或令为民。”再者，东南的京口、杭州等处“亦不必多驻官兵”，“此二处兵丁，亦应照例裁汰拨补。将所出额缺分例拣选索伦、察哈尔余丁派往伊犁驻防。”③ 凉州和庄浪旧驻满蒙兵移驻伊犁，又将京口、杭州等处汉军所出之缺给派往伊犁驻防的索伦、察哈尔兵丁，伊犁成为了全国驻防调动的中心。清初东南边疆驻防密集，有福州、广州、江宁、杭州、京口、苏州等处驻防重地。但是随着全国的统一，郑氏军事集团瓦解，台湾收复，安定局面出现，东南驻防消减，苏州驻防在康熙三年（1664）裁撤，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将京口驻防从将军级降到副都统驻防，仅留一名副都统驻镇江，归江宁将军管辖。而乾隆二十八年江宁驻防裁蒙古旗人一千五百九十二名，同年裁汰京口、杭州等处汉军所出之缺给派往伊犁驻防的索伦、察哈尔兵丁，东南军事力量减少，战略地位逐渐下降。上述调整直接说明清朝战略部署重点由东南向西北转变。

事实上，早在乾隆十九年，福州驻防汉军出旗，清廷便催促“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④ 翌年，广州汉军出旗，但京口与杭州汉军迟迟没有出旗。直到二十八年，清廷在充实伊犁驻防军事部署时，以“汉军既有准其出旗之例”，相应令京口与杭州汉军出旗。那么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这九年间，可能无暇顾及这二处出旗，又或者江南经济丰庶足以养赡旗人。由此可知，伊犁驻防是京口汉军出旗的推动力，又或者说是一种借口或一个机会。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拣派汉军旗人驻防伊犁，而是裁汉军缺给索伦、察哈尔，再拣派索伦、察哈尔去驻防伊犁呢？清廷有如下几方面考虑：一、雍正朝与准噶尔作战时，汉军旗人战斗力不强，使雍正帝对汉军旗人军事能力大为失望，⑤ 这也影响了乾隆朝君臣对汉军旗人的军事委派；二、索伦、察哈尔蒙古向称骁勇，与准噶尔、大小和卓作战时，表现英勇；三、乾隆南巡，检阅京口驻防军队，汉军“技艺甚劣”。故此，令京口汉军出旗，以空出缺额给索伦、察哈尔蒙古，令索伦、察哈尔蒙古移驻新疆。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容保、尹继善等奏议复将京口驻防汉军旗官兵或出旗为民或调入绿营折》，档案号：03－0180－2008－025。

② 定宜庄 《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 110—113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

④ 《清高宗实录》卷 469，乾隆十九年七月己亥。

⑤ 参见张建 《火器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

京口、杭州所出“各项额缺，给与索伦、察哈尔余丁，往驻伊犁，交该管将军、都统，拣选索伦一千名，察哈尔一千名，作为马甲，照例于应得兵饷外，给与盐菜银两”。① 在乾隆二十八年春天，先派索伦五百名、察哈尔五百名，“其眷口著后去五百名携带”。② 拣选索伦一千名，察哈尔一千名，共计兵缺二千名，从前文已知京口汉军所出兵缺为一千三百二十，那么可知杭州全部裁汰的一千九百名汉军旗兵中出缺为六百八十。索伦和察哈尔原没吃钱粮资格，但汉军出缺给予二者缺额，索伦从东北拣派、察哈尔从张家口拣派，使调往伊犁索伦和察哈尔人获得钱粮，全国兵力的调配“则于海疆、新疆地方均得劲旅，而索伦、察哈尔等获食钱粮，于其生计大有裨益”。③ 由此可见，京口汉军出旗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伊犁驻防。

伊犁驻防军力调配与京口汉军出旗一定范围内紧密结合，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汉军出旗结束，随即给缺于索伦、察哈尔兵丁驻防新疆，十月江宁蒙古旗人拨补京口完成。这些调配工作基本在一年内完成，如此紧急的战略部署调整，清廷周密计划，准备充分，考虑各种情况，经费充足，周到安置，有条不紊地进行，既没造成军事部署调整的混乱局面，也没有出现京口汉军出旗的明显负面影响。④

总而言之，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档案等文献综合来看，京口汉军出旗拨补内容相对丰富、完整，较详细记录了汉军出旗拨补与江宁蒙古旗人移驻京口情形，以及与伊犁驻防的关系。显而易见，在一定自愿原则下，京口汉军出旗“分例办理”、按部就班安置调补等，与“福建汉军出旗”例无异。除只移驻蒙古旗人，而非满洲或满、蒙旗人外，京口汉军出旗拨补不同之处，还在于伊犁驻防兵力调配为其推动力，从而使其成为全国军事部署调整中的一环，同时使解决旗人生计这一久悬的举措得以实施。

主要参考文献

[1] 定宜庄 《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年。

[2]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8 册，1982 年。

[4] 马协弟主编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绥远旗志、京口八旗志、福州驻防志（附琴江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5] 《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The Redeployment and Changing Status of Jingkou's Chinese Bannermen and the Garrison of Yili

SUN Shoup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sp030725@163. com)

Based on documents from the Six Manchu Archives of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nd supplemented "The Qianlong Palace Archives," "Qing Dynastic History" and other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settlement of Jingkou's Chinese Bannermen in 1763, also explores the transfer of Jiangning's Mongolian Banners to Jingkou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vacating the Chinese Banner garrison and the Xinjiang garrison.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vacating the Jingkou garrison was blending the force with the Yili garrison. Thus, vacating Jingkou was linked to a nationwide military redeploy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 disposed of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 livelihood of the bannermen.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

② 《清高宗实录》卷 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年，第 32 页。

④ 关于汉军出旗的影响请参见定宜庄 《清代八旗驻防研究》，第 233—235 页。